



## 中國政治出路的討論

胡適

丁文江先生的「中國政治的出路」(本報十一號)發表之後，國聞週報(九卷三十一期)登出一篇季廉先生的「挽救國難的一個私案」，次期(九卷三十二期)又登出一篇季廉先生批評丁先生的文字，題為「中國政治出路商榷」。這三篇文字都是討論中國政治出路的，都使我感覺深厚的興趣。丁先生不幸在山上病了一場，病起不久，他又出門旅行去了。他對於季廉先生的批評是否另有答覆，我不知道。我此時要說的，只是我個人對這三篇文字的感想。

先看季廉先生批評丁先生的五點：

一，季廉先生責備丁先生下錯了「武力革命」的定義。其實這是季廉先生把文字看錯了。丁先生說，改革政治的一條路「是用武力革命，在短時期內推翻原有的政府」。這裏他並不會下什麼革命定義，只是說用武力來在短時期內推翻政府的一條路。季廉先生誤把下半句看作上半句的定義，所以他錯怪丁君了。

二，他又責備丁君的「出路」都不能針對他所指出的

七個革命困難，所以「差不多不是對症之藥」。他說：

現在是什麼時候？現在是什麼局面？社會的崩潰就在目前，敵人的侵略已入堂奧，只是對於現在的政府用「要求」的方式來改革政治，會有成效嗎？……要想由「討論」「清理」「研究」中來找條出路，恐怕路還沒找着，敵人的飛機就來光臨了，共黨的暴動就要發生了。

這段話，我看了很覺得奇怪。季廉先生似乎忘了他自己剛在半個月之前還在一篇「最低限度的改革」裡提出四項「我們最低限度的要求」哩！(國聞週報九卷二十九期)他最近發表的幾篇大文章，那一篇不是「討論，清理，研究」的文章？——他最近還提議要「改造風俗」哩！風俗的改造怕也未必比敵人的飛機走的更快吧？——如果我的觀察不誤，季廉君和丁君同是想找到三年之艾來醫七年之病的。救國沒有捷徑，也許最近緩的路倒反是最快捷的路。

三，他說丁君文中有自相矛盾之處，比如丁君說過中國舊有的政府組織很少可以利用，何以他又對現政府提出



季廉君希望由全國教授聯合會發起組織這個全國職業聯合會。這個聯合會應該「向政府提出下列各種改革要求，願同政府協同研究，澈底合作，促其早日實現」：

- (1) 樹立有力的政府。
- (2) 認真執行既存法律。
- (3) 切實編裁軍隊。
- (4) 安定社會，發展生產。
- (5) 積極準備抵抗暴日。
- (6) 厲行鞏固國防。
- (7) 積極對俄復交。

「大會成立之後，先要作一兩件事（例如教育經費的獨立）試試力量。……有了美滿結果之後，再進一步作禁煙運動，或裁兵運動，先與政府合作，若果不能，再採取嚴厲手段。農人拒種鴉片，商會拒絕為政府籌款，商人拒納苛捐雜稅，全國報紙極力援助，這兩種運動也就不難達到目的。到了這個地步，聯合會的力量有了充分表現，經過嚴重實驗，証明明意志一致，步伐整齊，然後可以大有爲了。」

這是季廉君的「私案」的大旨。他自己說（九卷三十

二期）他的提議有四個優點：一，可以避免革命；二，可以使人民得到政治的訓練；三，「以職業團體或其他有實力有信用的團體聯合起來從事政治運動，現在已經有了基礎（例如廢除內戰大同盟）。將這種運動擴大，比較輕而易舉。」四，此案有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理論的根據。

我對於此案的原則是深表同情的。我們此時確實需要一個能够擔負政治責任的人民團體，一面幫助政府使他有力，一面監督政府不使他腐化。我想這個原則大概很少人不贊同的。但是季廉先生的議論，依我個人的觀察，未免太樂觀了，未免忽略了事實上的許多困難。

第一，我們的「全國各種有信用有實力的職業團體」究竟在那裏？季廉先生所列舉的許多團體中，除了銀行公會和律師公會之外，商會已很散漫了，工會只是無數不能合作的小團體，農會是壓根兒不存在，教育會是久已廢止了，新聞協會是沒有的。就是季廉先生所希望來發起這個新運動的「全國教授聯合會」，至今也還不曾應運而生。沒有這些分子團體，又何從產生那有力的全國聯合會呢？

第二，現有的各種職業團體又往往是四分五裂，不能合作的。即以上海的商會而論，就有不少的黨派糾紛。工會的分裂鬥爭更是大家知道的。各地教育界的派別紛爭也

是不可諱的事實；將來若有全國教授會的組織，我們很難希望一個「有信用有實力」的救國團體。

第三，現在所謂「公團」，那一個不是在黨部的掣制之下的？即以報館業而論，政府已有保障言論自由的種種法律及命令了，已明令停止電報與新聞的檢查了，然而各地報紙雜誌時時還受檢查，還被沒收或停止郵寄，我不會聽見有何地的「新聞協會」出來作一點點的抵抗。季廉先生所期望的「實力」又在那裏？他們不能抵抗本業的受壓迫摧殘，如何能有「實力」作全國的政治運動呢？

第四，季廉先生說他的提案「可以避免革命」，但他明明表示，「到了相當時期，如果政府不能盡他的職責，我們便祇好自動組織有力的政府」。這就是革命的事業了。這種革命的事業可以希望從上文所舉的職業團體裏發生嗎？他們能够負責這種政治責任嗎？

以上是我對於季廉先生的提案的幾個疑點。我的懷疑是因為他的說法有點「三分顏料開染坊」的過度樂觀而引起的懷疑。但我已說過，我是贊成他的原則的。中國今日應該有一個負責任的人民干政團體。但我們對於這個團體，希望不可太大，實效不可太急，更不必說「自動組織政府」一類的大話把虞洽卿、史量才一類的人嚇跑。我們不

能希望「全國人民齊集在一個嚴密組織之中，以四萬萬人的力量向共同的目標努力」。我們只能希望在最近幾年之內國中的智識階級和職業階級的優秀人才能組織一個可以監督政府指導政府並且援助政府的干政團體。

這個干政團體的產生，依我個人的估計，在最初時期，應該從下列的幾種團體裡出來：

(一)學術團體：如中國經濟學社，中國社會科學社，中國政治學會，中國工程學會，中國地質學會……以及各大學教授會，各地學者的小組織之類。

(二)商人團體：如重要城市有組織的商會，銀行公會，錢業公會之類。

(三)技術職業團體：如律師公會，記者公會，郵務公會，以及其他技術職工的組合，如南方的機器工會，海員公會之類。

這些團體本身都站得住，都有相當的信用，其中都含有知識高明眼光遠大的分子，只要有能負責任的領袖人物出來號召，我想，在一種積極的，建設的，有益於國家民族的目標之下，應該可以產生一個有計畫有力量的政治大組合。

這樣一個團結，如果沒有更適當的名稱，我們或者可以稱他做『建國大同盟』。因為今日的真問題，其實不是敵人的飛機何時飛到我們屋上的問題，也不僅僅是抗日聯俄的問題，也不是共產黨的問題，乃是怎樣建設一個統一的，治安的，普遍繁榮的中華國家的問題。我們要擔負的

政治責任，就是這個建設國家的責任。如果我們能在這個『建國』的大目標之下，把國中的智識，技術，職業的人才組織起來，也許就是中國政治的一條出路罷？

二一，九，五夜。

## 中國地下富源的估計

翁文灝

雖然近十幾年來我們已够作孽——糟蹋了不少日本紙，報告我們礦產調查的結果，但還是不斷的有人問我中國礦產到底是富饒，煤鐵够用麼。有這種問題的人大約是聽了或看了外國人的矛盾的議論，覺得不容易判斷，因而引起了對於中國的物質發展前途的擔心。現在且把這種觀念的變遷從頭說起。

外國人對於中國的觀察起初當然是很淺薄的，且不要說馬哥孛羅對於煤礦的少見多怪，直到了前清初年被康熙帝派到各省去測繪地圖的法國教士，還有這樣記載（見一七三五年杜赫德所著書）：

中國各山礦藏豐富極了，地方上人都說金銀各礦無一不全。但是直到現在還沒有好好的開採，正是

他們一定的政策，因為開了礦會弄得百姓太有錢了，太滿足了，反使得地方不安。……石炭更加豐富，世界最富的國家都不能及，山西陝西北直隸各省滿山皆是。……

一百三十年之後德國地質大家李希霍芬到中國來考察了。他因受了上海英國商會的津貼，所以沿路都有通信報告。對於山西的煤礦，他說：

可見山西真是世界上煤鐵最豐富的地方，照現在世界的銷路來算，他可以單獨供給全世界幾千年。美國代那教授曾經計算本西佛尼州四萬四千方哩中煤田面積佔了二萬方哩，他以為全世界煤礦要算該州為最富。殊不知中國的山西有五萬五千方哩的面

藉，他的煤礦之富要比本西佛尼州勝過許多，而且開採極其容易，價值極低，可以大量的出產。

這是一八七〇年六月李希霍芬在北京寫的，「可供世界之用幾千年」云云到現在中國中小學教科書中還往往整個引用著。雖然全世界的煤鐵產銷額六十年以來都已增加了七倍，山西的礦藏却決不會生長，所以李希霍芬在那時說可供給那時的世界幾千年，在現時的世界決不能供給的同樣長久，這是很顯明的事實。所以即使他的觀察不差，他的文章現在也不能抄了。而且李希霍芬那時已看見了二種困難：一是離海太遠交通不便；二是地勢甚高，自山西到平原造鐵路很不容易。這種困難非常實在，他能預先見到，真可佩服。

但是當時的調查實在簡略得很。一八九八年英商福公司取得了山西河南的大礦權之後，方始做了一些詳細考察。他們所聘的美籍工程師宿克來 W. H. Shockley 報告山西鐵礦只有數寸至一尺厚，最多不過三尺，雖然本地傳說從前會偶有開到二丈的。後來李德 (Thomas Reed) 也去調查，得到同樣結論，說山西鐵礦分布面積雖廣，但為大規模新法化鐵爐是不夠用的。他的報告曾在一九一〇年瑞典國際地質學會發表。從此中國富於鐵礦之說已經動搖。

### 獨立評論 第十七號 中國地下富源的估計

民國三年張謇做北京的農商總長，提倡他所謂棉鐵政策，聘請幾個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丁格蘭等，調查國內的鐵礦。不久地質調查所的中國人也參加及繼續那種工作。有時還加以實行探礦。做到民國十年，總算大略告一段落，著成了一部中國鐵礦誌，把全國——至少交通較便，經濟上可以新法經營的地方，——重要鐵礦都做了一個具體的計算。全國鐵礦砂總儲量是九萬七千萬噸，其中遼寧一省却佔了七萬四千萬噸。除了遼寧，在關內的只有二萬三千萬噸。即使連遼寧在內，照美國每年要開採一萬萬噸的比例，也九年便可開完。所以中國的鐵礦真不算多，從前取用不竭的觀察，真是錯誤，真是沒有夢想到近代工業規模之大。固然民國十年的計算並不能信為完全，即如地質調查所在民國十年以後發見的也可加上三四千萬噸。但究竟所加無多，大數上並無根本變動。此外如西北科學考察團所發見的白雲鄂博，以及廣東建設廳所勘定的雲浮鐵礦，也會在報上宣傳一時。但我曾經打聽深知其地的人們，據說並不能如此樂觀。綏遠也許可有幾百萬至一千萬噸，廣東更多是些浮面的褐鐵礦及少量的赤鐵礦。可見此後發見愈弄愈難，根本結論似乎不容易變更。我們只能對日本自傲，因為他們只有六千萬至八千萬噸的鐵礦儲量，而每年

銷費額却要三百萬噸，自己供給力不過二十年。中國每年銷費額還是很少，即使理想的增加到日本一樣我們還能自己供給三百多年。但除了東三省，我們所有的鐵礦便不敷一百年之用了。這當然不過只給一個大概的觀念，事實上並不如此簡單。然而從此之後中國鐵礦之豐冠於天下，或用山西四川的薄層鐵礦，來開一天幾百或幾千噸的大鐵廠，這種念頭在外國專家之中已不會有的了。（註一）

所以除了遼寧省之外中國鐵礦真是甚窮，要是靠這一些來發展大規模的鋼鐵業真要格外珍惜格外節省。不過我們現在並說不到此。除了遼寧省日本人辦的鐵廠不計外，中國已有的新法化鐵爐如龍煙漢冶萍等合起來本有每天一千三百噸的能力，現在都因軍事的擾亂，行政的干涉以及種種原因把他們都停閉了，只剩了漢口的六河溝公司一個爐子還每天幾十噸勉強掙扎着。如果我們這樣的不會用，那末二萬萬噸的儲藏量真還太多了。

不過我們對於鐵礦雖然不會自己製煉，却會現成的賣出去。算到民國二年止，湖北大冶（連象鼻山在內）共已賣出六百萬噸，安徽繁昌當塗二縣共已賣出四百萬噸。這一千萬噸都是含鐵百分六十左右的好礦，都為日本八幡

等廠製成鐵和鋼了。（註二）

近年意見最不一致的，是關於中國煤礦富源的估計。

一九一二年坎拿大開國際地質學會議，要統計全世界的煤礦儲量。那時中國還無人出席，而中國煤礦又是著名豐富遺漏不得，所以他們請了一個美國人杜雷克（N. F. Drake 曾做北洋大學教授）一個日本人井上禧之助（方任日本地質調查所所長）各做了一篇文章。杜氏的總數是九十九萬六千多兆噸，井上氏說只有三萬九千兆噸，兩數相差到二十五倍，可見當時知識的缺乏。不過大多數留心中國事情的外國學者都不相信井上的估計，而默認杜雷克的數目為可靠，只用他來做比較標準。照那次計算，世界各國煤礦之富要推美國為第一，坎拿大第二，中國第三，德國第四，英國第五。這個估計因為是國際地質學會議所發表的，現在還有許多人信為唯一的確實可靠。所以我們地質調查所的新估計發表後，因為與此不符，便有二三個外國學者（？）表示懷疑的口氣。中國朋友以為外國人既不相信，一定是不可靠，不過原諒我們工作時間太短，所以沒有調查完全。其實並不是那麼一回事。一九一二年各國煤礦估計太匆促，原是錯誤很多，各國都重加估計了。坎拿大原估為一百二十三萬兆噸，重估後跌到十七萬兆噸，差了七

倍有餘。德國最新估計是十一萬兆噸（連薩爾在內），比一九二二年原估的四十四萬兆噸，要減少四倍。連歐美各國尚且能相差如此，估計中國煤礦的杜雷克不過根據很窄的個人經驗，大部份還是爲李希霍芬所影響，他的估計豈能作爲鐵案？何以現在講中國富源的偏要咬定舊數不肯更改？

照中國地質調查所的估計，中國全國（當然連東三省在內）煤礦儲量共有二十餘萬兆噸，比杜雷克原估要小三倍至四倍，這個數目是有許多實地測量及許多參攷材料做基礎，而且經過二次獨立計算大致相符，我們自信是比較可靠的。這個數目比杜雷克的固然減少了，但若照坎拿大德國等新估計作比較，中國反從世界第三位升到了第二位，只有美國還比我們富的多。

如此中國的煤要算富的了。不過開採的却是極少，除了撫順開採之外全年只出產一千三百萬噸。即使連撫開二大礦在內，每年也不過二千五百萬噸。如此節省下去還可供給一萬年之用，真是太多了。所以煤就是一種我國特有的富源，應該大大的開發他，一方面自己用，一方面應該輸出外國，換回資本，以抵銷購置機器等生產材料的損失。德英是歐洲煤礦最富的，合衆國是美洲煤礦最富的，這

種從煤礦而發生的經濟力量他們都已充分發揮了。中國是亞洲煤礦最富的，但應該如何好好利用呢？但煤的分布又是各處很不平均的，北方的遼冀魯豫確是不少，但開發已差不多了。南方的川湘滇黔也很出名，但層薄質劣，比北方已差得遠了。最富的始終要推山西，儲量佔全國百分之五十，種類也各式皆有。只是像李希霍芬早就見到的，太行山隔在內地，一時運不出來。所以像石大鐵路等的建築關係實甚重要。解決這個問題，不是一省的事，乃是全國的事。

△ △ △

講到石油，地下富源的估計更加困難了。照美國地質調查所的計算，現在剩下來富源最大是南美洲各國的總額，共有一千三百六十兆噸。美國與俄國差不多，各有一千兆噸。波斯及美索波達米亞次之，共有八百餘兆噸。又次爲墨西哥及南洋羣島，皆在五百兆噸上下。再次爲中國日本及歐洲各國，（除俄國外）約各二百兆噸弱。其中關於中國的數字是否可靠，我實在不敢說。中國油礦的分布是在新疆甘肅陝西四川我們是知道的，尤其於川陝二省我們已有相當詳細的調查。只是油量估計不能全照外國老例推測，必須經過實際鑽探方能知道。中國只有陝西油田在

民國三年北京政府與美孚合辦時，曾經鑽探過，不過當時是一種臨時特別組織，技術上至少地質工作上全由美國人主持，中國似乎沒人參加，所以各事無人接洽，至少我從未看見有一個中國人的報告。美國技師的鑽探報告留下給我們見到的似乎都不很完全。地質只有粗報，油量並未確載，難道還有別的材料為美國方面所有，而中國方面沒有得到麼？還是中國自己損失了呢？我曾經與原經手的美國技師通信，請他們做一個完全報告給我，但他們要求很大的報酬，嚇得我不敢再說。無論如何，美國人說中國儲油量有一三七五兆桶（七桶成一噸），這樣的細數，就我們現在所知，叫我是估計不出的。如果此說屬實，則中國油礦近于日本還稍多一些，已不算太壞了。但日本每年產油二十多萬噸，中國還產不到五百噸。中國煤油汽油用途日廣，對於油礦的探採是必須趕緊進行的。

○ ○ ○  
以上三種可算是最重要的礦。關於此三種礦產富源的

估計固然還有其他許多不同的意見，但是自己毫無真知會抄襲和空想的議論，我們當然不必討論。此外如錫和鎳都是中國所特富為世界各國所不能及的，只可惜用途有限，于經濟不發生很大的影響。錫鐵等礦中國也還不算頂少。金礦要推黑龍江為頂富，可惜現在情形不同了。但金礦究竟有限，黑吉兩省的金礦儲量，據俄人阿也耳特近于大膽的計算也只值二千三百兆金元。

總結一句，中國地大物博固然不能信仰太過，但是尙未開發的地下富源照目前情形確還不算甚少，不宜過于短氣。我們現在已到民窮財盡不得了的時代，似乎可以暫時擱起康熙年罵西洋教士的政治哲學：「不許百姓開礦，因為恐怕他們會太有錢了。」

（註一）參看丁文江「漫遊散記」八（本刊第十六號）  
（註二）參看翁文灝「日本人如何取得鐵礦砂的供給」。  
（本刊第一號）。

## 故宮博物院的謎

叔永

最近幾天來，中外人士所仰望為東方古物淵藪的故宮

博物院，忽然在疑雲籠罩之下，成了輿論注意的中心。構

成疑雲的事件有兩個：一是所謂私售古物事件，一是所謂遷移抵押事件。關於前者，有北平政務委員會派員視察的提議；關於後者，有北平學者陳寅恪等上南北各要人的長信及上海各大學教授抗日救國會的專電。

以上兩件事體的輕重，當然不可一概而論。如所謂私售古物事件，所關係的不過少數不甚重要的物品，論其價值，也不過幾十萬元的出入。只要他們辦理的手續完備賬目清楚，而所售出的項款，又無侵吞中飽的弊病，似乎無論何人，沒有甚麼非反對不可的理由。至於遷移抵押的問題，則關係故宮博物院整個的存亡。故宮博物院的收藏，雖不足以代表中國幾千年文化的結晶，至少也就關係中國一部分文物的存亡。北平政務委員會，何以僅問較小的「私售古物」事件，而不問對於較大的「遷移抵押」事件有所表示，僅有幾個大學教授出來大聲疾呼？這是我們不解的第一個謎。

中國是有名的謠言國，何況在危疑震盪的時候？何況有深切的利害關係時候？所以關於故宮博物院的種種謠言，我們以為毫不足怪。消滅謠言的最妙方法，是宣布事實的真相。我們曾經看見故宮博物院發表的聲明（見北平及天津九月四日各報），對於「私售古物」一事，已有相當

的說明。不過對於「遷移抵押」一層，雖經他們拿裝箱入庫房來說明謠言之所由起，但這決不足以證明政府沒有遷移抵押的用心或計畫。因為果然一旦有遷移行為，裝了箱子不是更便於實行嗎？進了庫房，就不能再行搬出嗎？況且遷移抵押，也不是故宮博物院的當局所能主持的事，所以故宮博物院當局的聲明，本來是無足輕重的。除非故宮博物院的當局，鄭重的向國民聲明，他們必定要盡力保全這個博物院，倘若政府命令他們遷移抵押，他們也誓死不奉命令。但是這樣的一個聲明，究竟還不如政府直接聲明，故宮博物院必須整個的保存，無論在甚麼情形之下，決不遷移或變賣的好得多。我們所不解的，政府當局，既得南北各教授的緘電以及易寅村院長等的報告，何以至今還沒有一個表明態度以消滅一切推測謠言的聲明發表？

這是故宮博物院的第二個謎。

還有第三個更大更難解決的謎，便是：故宮博物院的前途究竟怎樣？我們曉得在這樣嚴重困難之下，主張遷移，不見得便是破壞故宮博物院。主持抵押或變賣，當然又當別論了。不過若是有人主張以遷移為保全故宮博物院的

一個方法，我們要請他注意下列幾點：

一，照目下的情形，若是北平不安全，何處算是安全的

地方？洛陽嗎？西安嗎？這些地方，不但兵險不能保，就是水險火險也不容易保了。

二，聽說故宮博物院的物品，裝起箱來，已不下千餘個。這樣大批的箱籠，經過長途輪船火車的運輸，誰能保定途中不出事呢？

三，故宮博物院之所以難得，不但是因為他有許多古物，乃是因為他把許多時代的古物搜羅在一起，可以作比較研究的用處。一經搬移，即使不至損失，亦不免分散，那末，古物的功用也就減少了。

從以上種種考慮，我們以為故宮博物院，若有保存的可能，只有「就地保存」的一法。要做到「就地保存」，我們以為有兩類人應負特別責任。

一，在故宮博物院範圍以內，應由故宮博物院的當局人完全負責。政府既把這一付中華國寶，交與公等保管，公等應存「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的決心，不容有一紙一瓶，由公等手中喪失。

二，在故宮博物院範圍以外，如何能使這個無價的寶藏，安然無恙，渡過這個難關，則是中央政府及地方當局的責任。故宮博物院的負責人們，若保管的不得當，公等固當盡監察的責任；但在故宮博物院範圍以外，為該院當局權力之所不及，則保護維持，公等尤責無旁貸，不容存一「必烹若翁，請分我一杯羹」的觀念。

以上兩層，若做得到，我們以為故宮博物院的前途，并無所用其悲觀。若萬不得已而歸於破壞，但使這個破壞不是由我們自己發動的，但使我們曾經盡過自己的力量以圖保全過的，即使終歸破壞與毀滅，也可以告無罪於已往的祖宗與未來的子孫。我的朋友傅孟真君有句話說的好：「國寶皆是人造的。我們總要給我們的子孫留下一個更為世界供獻的憑藉，這即是國民的人格」。我們希望注意北平古物的人們，多想一想這句話。

二十一，九，五。

## 改革高等教育的討論

吳世昌

備之餘，對於我是一種興奮。我是今年剛從大學畢業的一個學生，四年來感受此問題之嚴重與深刻，無時或已，也常常與師友慎重討論過。現在把我的意見寫出來，愚者千慮，容有一得；而且因為自己是在校學生，對此問題之認識或較親切。用敢不揣冒昧，謹就教於先生：

我以為要整頓現在的大學教育，解決私立大學及提高學術程度，改革學風諸端，殆皆可從下列兩個問題入手：

- 一，「學士」學位的授予問題。
- 二，大學的課程，講授問題。

一，「學士」學位的授予問題，——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一般青年入大學，大多數（雖然不是全數）是為將來謀職業的資格。各界（政界例外）的聘用人員，也大都以資格為去取標準。因求智識而獲得資格，本來是很自然的現象，也是事理之常。但却因此引起社會上一些不肖分子，利用青年的弱點，弄了許多私立「大學」，上則隱蔽敷衍政府，以求倖存；下則欺騙中學的青年，騙取四年學費，發了幾片講義，就貿貿然給他一個「文學士」或「法學士」，那些青年，也以「文學士」「法學士」居之而不慚。這是指一般「野雞大學」而言，其餘比較切實認真的大學，因為院系重疊，內容複雜，教員優劣有別，分數寬

緊不同；有的老實一些的學生，選着認真的教員，孜孜四十年，儘免被斥。有的不好讀書，却善揣摩，論文有人代做，分數準有把握，吃喝嬉戲了四年，不但成績優異，方冠加頂，有時還有各種獎學金到手。我知道這類的例子多極了。這類惡現象不鏟除，一切問題無從解決。所以我以為孟真先生主張廢止年級制極對。但我的意見稍有補充，異同，而尤注重改善授予學位的方法。茲具體簡述如下：

- 一，各大學，不論其為國立，省立，或私立，不得擅自授予學位。學位之授予，必須經過「國家考試」。
- 二，此項「國家考試」，可由教部聘各大學教授及各專家組織委員會主持之。試題由委員會擬定後送教部，

由教部擇定後，密封頒發全國各大學。指令各大學請求學位之學生受試，全國同日舉行，由各該大學行政人員監考，試卷彙送教部，由教部分發委員會評閱。合格者由教部授予學位，否則不得自稱文學士，亦不得稱某大學畢業，祇准稱肄業。

- 三，此項「國家考試」，凡國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肄業三年以上之學生，均可應試。為獎勵貧寒子弟自習起見，非大學學生，凡有著作，於學術上確有據其貢獻，經專家委員二人以上之認可，亦得應試，（理學院

學生因有種種實驗，限制或可稍嚴。）

四，此項「國家考試」，每系應考課程，至少須在十種或十五種以上。（清華大學研究院入學考試，即有多至十二三種者。）蓋非如此，不足以賅括各系主要課程；並以昭鄭重而杜倖進。考試時間可延長至一月左右，以資休息與預備。日期不必限於嚴寒海暑。本屆不取學生，下屆可再考。

五，每屆應試學生，其屬於學校者事前由各校呈報教部。個人應試則向各地教育局報名轉呈。由教部發給編定號碼，凡試卷，不準用姓名校名，概用號數。——教部或可設專司以主此事。

六，國家考試專家委員會，得依各不同之學系而組若干小組委員會，（如物理組委員會，歷史組委員會等。）

（一）籌劃種種妥善方便之措施。

這個國家考試制度若能實行，至少有下列種種好處：  
（1）大學行政與經費的經濟——如果實施此制，學生不得不求切實的學問以應考，其他一切名義於他全無益處，學校和學生都不得不力謀「擁緊」，以求增加效率。

（2）不像樣的大學，和較像樣的大學內的不像樣教授，非別不可。

（3）減少學校的風潮，增加師生的感情。——我的一个朋友黃迪先生，他用二年功夫專研究中國的學潮，據他的統計，每次風潮的發生時間，百分之九十餘是在學期考試前兩三個星期以內，（他有 *Time*）很清楚的，每次學潮，意識的或非意識的，都含有避免學期考試的心理作用在內。其實學校的考試本來是為定分數的標準，而分數又不一定足以代表實學。現在把考試重心移到他四年所習的總結算上去，學期考試反而不重要。乾脆廢去也沒關係。這樣，不僅可以減除風潮，並且還可增進學生和教員的感情。因為一有「分數」「季考」一類制度，學生和教員的關係不免是業務（Business）的，而不是學術的（Academic）。沒有這一套，學生和教員大家都以真實的學力相砥磨，相頡頏，學術上才有毫無忌憚的真實的發現。

（4）養成自由研究自由講學的風氣——不入大學的個人也可以憑著述而應試，是補救現在「祇有中產以上的子弟才有求高深學術的機會」唯一可能的辦法。此制如能實施，有志深造而無力升學的中學畢業生可以在公共圖書館裏鑽研，如能考得學位，便有深造的機會。又如以前的中學生或大學生現在各處供職的，也可以出其餘力，致力學

間，若干年後，也可以有應試學位的機會。

(5) 全國大學程度可一致提高。——現今各地的大學程度相差極遠。即以歷史一項而論，北平學術界所討論的「北京人」，「石器時代」，「銅器時代」，「堯舜的有無」，諸問題，而南方大學中却還是什麼「三皇五帝」，「八索九丘」一類問題！但如專家委員會成立，全國學生受試的題目都是一樣。各處大學立刻發生三種直接的需求：第一，各大學各學系中之基本主要課程，必須合於專家委員會所擬定的，祇能多，不能少。第二，各基本主要課程的內容必須充實。這樣一來，不但學生要用功，教員也不能祇抱「混飯碗」主義，也被逼着用功。第三，各大學必須把學系分清楚，再不能像前幾年我經驗過的天津某私立大學一樣，所謂「文科」，政治，經濟，社會，心理，佛經，歷史……什麼都有，什麼都只讀一本「導論」！私立大學經費支絀，不能聘許多教授的，不得不歸併裁縮，切切實實辦一個學院或幾個學系，再不能撐一個「大學」的空場面，叫學生摸進去了叫苦連天！

總括的說，這個考試制度，兼有現代學校和以前科學的各種優點而沒有牠們的弊端。或以這樣的考試也不一定公平，考試不一定能代表學問。因此，許多有學問的學

生或反而一輩子不能得學位。我以為這也不妨事。真有學問的人他可以著作鳴於時，並不在乎學位不學位。在科舉時代也是一樣的，陳蘭甫一代鴻儒，屢試未中，姜西溟才調絕世，到晚年才入榜，可是他們早已名滿天下了。英國十九世紀的詩人，多半是棄方輟如敝屣的。沒有一種制度是「完全」的，我們祇能求其最合乎情理，最經濟，最有效率的施行。據我所知，此項政府考試畢業生的辦法，福建省教廳已施之該省中學畢業生，頗著成效。

二、大學的課程，講授問題。——這問題和上面的問題是分不開的。「國家考試」如施行，最先受嚴格審查與整頓的是課程。現在各大學的課程，不曉什麼回事。拿中國文學系而論，陶潛，杜甫，李白沒人講，清真，義山，夢窗反而有人開專班！以視牛津劍橋之以莎士比亞為入學必考課程者，識見之差相去何遠！我以為各系課程應該由各大學教授先決定一個主要的大體。把四年大學分成二期，前期完全是本系及全校的必修課，基本訓練。孟真先生主張「除第一年級比較課程固定外，其餘多採選習制。」我不大贊同。我從前初入大學也反對必修科，現在才覺悟到選科之貽誤初學。一個中學畢業生，入理科的不必說，不念基本科目根本就念不上去。就是讀文科料的何嘗不

當受嚴格的文字訓練？大學生的國文是一般認為沒有問題的，但我前幾天拜訪一位國立某大學的國文系教授，他皺着眉頭說怎麼辦，連國文主修生都寫不濟一篇普通文字？不是那位教授說，我也許還不信。英文更應受訓練，普通入學考試合格者，大都祇能讀淺近的英文教科書。如果要深造英文文學，如 Milton, Donne 的詩，Arnold, Carlyle 的論文，Bosquet, Santayana 的美學，近人如 Richards, Eliot 的文學批評，不受嚴格的必修科的訓練成嗎？人的思想總喜歡往抵抗力最小方面去。這類的文字一篇兩篇看不懂，誰願意看第三第四篇，要不是必修科的話？別系也是一樣，歷史系的尚書，儀禮，元典章；哲學系的 Hegel, Kant，也決不是未受嚴格的文字訓練者所能鑽研。器之不良，工於何有？我在這裡念的是英文學系。我當初曾深悔不該不進我同時考入的某國立大學，因為我知道該校的外國文學系極好，書籍多，教授多。我對於自己的學系不滿極了，美國教員對於文學見解的迂腐淺薄，對於文學時潮的諛陋固執真是不可救藥。但他們對於語文本身的訓練真是認真盡職。第一二兩年的大學英文差不多每天都要學生寫文章，他替你逐字逐句改了，又請學生到他辦公室裡逐字逐句和你分析討論。非至你寫，讀，說三種能力無愧

不肯干休。後來我和那個以外國文學系著名的某大學的教授談起，他說他那學校的主修生雖然不少，而能寫作無愧者祇寥寥三數人。大多數祇懂得幾個什麼主義的口頭禪！他因而懷疑到中國的大學內是否應辦外國文學系！我竊恐有此情形者，不僅某校一校，外國文學一系而已。所以以為大學中第一二兩年，最宜嚴格的訓練基本主要課程。必修課越多越好！（對於學校行政也經濟。）現在不給學生以自由，正所以給他們將來更大的自由！現在工具沒有磨礪好，將來這本書瞧着頭痛，那種材料不知如何去找，才是學術上最苦痛的不自由！所應注意者，教必修課的教員必須是有實學而肯負責認真。但如上述的「國家考試」制度能施行，無實學而不認真的教員自然受淘汰。

除必修課須要規則的訓練之外，後期大學比較高深的課程，不必死板的規定每週幾小時。因為：第一，高深學術貴乎自由研討，學生智愚有別，同一部書，穎悟的一月所能全通者，遲鈍的二個月也許還多疑竇隔闕。把幾十個愚智不同的學生塞在一個教室裏，聽一個教授，讀同一本書，實在是極不合理的事。倒霉的是天才（他白費時間），做伴的是中智，吃苦的是下智。天才不得不老是等別人，下智却汗流浹背趕不上。

第二，高深學術，學生應

自己研究，教授不過居於指導或共同研究的地位。一個教授每週要講許多鐘點，那裏有這許多話？如果是前人或別人講過的，乾脆讓學生自己看去！必要時討論指導就夠了。爲要滿足鐘點而勉強講，則所講不是敷衍拉湊，必是陳腐舊套，勢非成爲教書匠或說書匠不可。

此函寫得長了，請原諒。關於「國家考試」許多意見是我朋友翁獨健先生的，應當說明。

吳世昌

編者附記：

孟真先生把吳世昌先生此文交來之後，他自己就生了腸胃病，所以不能答覆，只好等他病愈之後再作答了。

吳先生原文太長，我們爲篇幅所限，不能不刪去一部分，要請他原諒。

## 也談談輔幣問題

吳嵩慶

讀了高夢旦先生的「廣兩爲元後處理輔幣的小問題」（見本刊第十四號），引起我的研究興味，也想加入討論。不過劈頭就和高先生意見不同，因爲高先生認定這是個「小問題」，我則認爲是很嚴重的大問題哩。

### 幾個經驗

凡是性好旅行的朋友們，對於我國副幣的複雜，和各地的差異，大概均有同樣的感想罷。我現在且不談副幣和正幣的比價漲落不定的害處，和其計算的困難，無謂地損失了很多的光陰和精力；現在且說些我所見到的各地副幣差異的情形。

上海和南京，只有八小時車程的距離，宜乎副幣不應再有什麼差異；但是上海通用的九年十年的雙毫，到南京並不能通用；如果要使用，每個雙毫非受幾個銅元的損失不可。南京通用的七年八年的雙毫，有時從我淺薄的辨識力看來，實在是銅質，但是他們還願意接受，一到上海，竟被拒絕使用了。所以到上海旅行一次，非把從那裏帶來的雙毫，在車上揮霍淨盡，或是回到南京把牠攔起，留待下次到上海再用不可！一到南京，還得現兌。十七年我離開南京時，是這樣的情形，去年故地重遊，仍是這樣情形，沒有改善。

船過南京，向上流駛去，情形又變了，在漢口的副幣似乎只有大子（當二十的銅元），換了一塊錢，真是無法在身邊存放這笨重的貨幣。長沙通用的還是大子，但另有一種雙毫的大洋票，是一個電燈廠發行的，電燈廠也居然發行紙幣，真是奇聞！（以上均是十七年的情形）

沿平漢路北上，沿路各站，還是通行當二十銅元，不過兌換率有些差異。一到北平，除大子兒之外，還有銅元票大洋票等，大洋票也有各銀行所發行的不同。據我看來，北平人還算幸福，因為副幣的兌換率還算穩定，四吊錢換大洋一毫，計算也很便利。

廣州情形又不同了，通用的是中山像的雙毫，十毫算作一元毫洋，計算很為方便，不過廣州沒有毫洋，十元的毫洋票也很少見，如果我們帶去的是大洋或是港幣，兌換率又極不一律，兌換店的利潤自然很大，無怪長堤一帶兌換店之多了。至于劣幣之多，更非我們所想像得到！初到羊城旅行的我，雖然已承一位略能說上海話的廣東旅客，在廣九車上指教我怎樣是好幣和劣幣，但是在廣州二星期的勾留中，受劣幣的吃虧，共有四五十毫。每次兌換十元大洋，必得費十餘分鐘去鑑別優劣，結果還是不行。有一次到書局去買書，他們有一個小天平去秤雙毫，以鑑別其

優劣；結果，我所有的毫子，一個也沒有及格，後來拿十元大洋票去現兌，跑了一里路沒有換到，結果書還沒有買成。聽說以重量來甄別優劣，還是靠不住，那末，在廣州使用副幣，必須有專家的資格了。

從香港起，過西貢，新嘉坡，哥倫布，……以至馬賽，一路上使用十進位的副幣制，真引起我無限的羨慕。在法國通用的五十，二十五，十個，五個生的，計算固很方便，又是全國通用，這是怎樣使我初到異邦的引為便利呀！譬如買一份普通日報，給他一個二十五生的副幣就是，買一份巴黎時報，也不過你給他五十生的，他找你十個生的就行，不必如國內用多量銅元數着了。譬如用一百法郎去買三十五法郎六十五生的東西，他們計算也很方便，從下向上推算，手裏加着副幣，口裏念着數目：六十五，七十五，一法郎，五法郎，合成四十法郎，五十法郎，一百法郎；就是說：他應找你一個十生的，一個二十五生的，四個法郎，一張十法郎和一張五十法郎的鈔票。如果在國內，不知要打了幾分鐘算盤，衣袋裡要增加多少的重量呢！

英國的副幣，雖然並沒有採用十進位，但是因為正副幣比價的一定不易，所以他們可把一切價格，列成一表，

無論買多少數量，按表一案即得，找兌均很方便，都不必如中國大洋化小洋，銅元的麻煩了。

### 問題的主因

我們中國的副幣，爲什麼這樣的複雜而不統一呢？我以爲這是地盤主義的結晶！換句話說，如果地盤主義不打破，副幣製造權或發行權不統一，中國的副幣制度，永不能改善的！

副幣實質的價值，並不與其面值相稱，其實也不應與面值相同，使笨重難攜。製造輔幣應有的利潤，是應爲中央政府固有的收入。我國各地的造幣廠林立，主持者，「以造幣爲手段，以籌款爲目的」，（高先生語）以二角及當十當二十銅元，有利可圖，盡量加鑄，結果：

（1）劣貨幣驅逐好貨幣，光緒銅元已不易見。

（2）通貨膨脹，價值貶落，本來一元換一百枚當十銅元的，現在可換三百枚，購買力減小，受影響最大的

，就是人力車夫等苦力和小商人。

（3）各地的副幣，質量均不相稱，各地的兌換價值亦不同，於是販運二地間大批副幣，成爲違法營業，各地的副幣，均成地方化了！

所以，輔幣的複雜差異，是以造幣爲營利方法的地盤主義的結晶！

如果造幣機關不統一于中央，不打破只管營利，不顧貨幣的供求的地方造幣制，無論怎樣的改良方法，將來亦必漸被擾亂的。這是一個先決條件。

現在中央銀行的一毫二毫鈔票，已盛行于京滬，如果能逐漸推行于各大城市，有充分的基金，確立信用，先把雜色毫票肅清，然後逐漸收回改鑄一角二角銀幣，加鑄五角銀幣，五分銀幣，把副幣的毫角等級先統一了，再着手改鑄一分五釐的基本副幣，那末，這複雜的副幣問題，未始不能于二年或三年的短期內，得一個總解決吧？

## 北戴河有什麼

秋水

（一）提到北戴河，我們一定要聯想到兩件事，其一是洋化

，其二是時髦。我不幸是一個出過大洋也不會洗掉泥土氣的人，又不幸是一個最笨于趨時，最不會摩登的人。故我

的到北戴河去——不僅是去，而且是去時心躍躍，回時心戀戀的——當然另有一個道理。

千般運動，萬般武藝，于我是都無緣的，雖然這是我生平的一件愧事。想起來，我幼小時也學過騎馬，少年時也學過溜冰，打過網球，騎過自行車，但他們于我似乎都沒有緣。一件一件的碰到我，又一件一件的悄悄走開去，在我的意志上從不曾留下一點點的痕跡，在我的情感上也未曾留下一點點的依戀和惆悵。却不料在這樣一個沒出息的人身上，游泳的神反而找到了一個忠愛的門徒。當我躍身入水的時候，真如渴者得飲，有說不出的愉快。游泳之後，再把身子四平八穩的放在水面，全身的肌肉便會鬆弛起來，而腦筋也就立刻得到了比睡眠更爲安逸的休息。但聞呼呼的波浪聲在耳畔來去，但覺身如羽毛，隨波上下，心神飄逸，四大皆空。

除去游泳之外，北戴河于我還有一個大引誘，那便是那無邊無際的海。當你坐著洋車，自車站出發之後，不久便可以看見遠遠的一片弧形浮光，你的心便會不自主的狂躍起來，而你的窒塞的心緒，也立刻會感到一種疏散的清涼。我們此次在那裏共住了六天。最初的四天，是白天晴日當空，天無片雲，入夜烏雲層層，不見月光。但我們每

晚仍到沙灘上去看雪浪拍岸，聽海潮狂嘯。雖然重雲蔽月，但在微明半暗之中，也可以另外感到一種自然的偉大。有一天，夕陽方下，餘光未滅，沙上海邊，闕無一人。遠望去，天水相接，一樣的無邊無垠。忽見東方遠遠的飛來了三隻孤鳥，他們飛得那樣的從容，那樣的整齊。飛過我們的坐處，再向西去，便漸飛漸小，成爲兩三個黑點。黑點又漸漸的變淡，淡到與天際浮烟一樣，才不見了。那時不知道怎的，我心中忽然起了一陣深刻的寂寞與悲哀。三隻孤鳥，不知從何處來，也不知到何處去，在海天茫茫，暮色淒涼之時，與我們這兩個孤客，偶然有此一遇，便又從此天涯。山石海潮，千古如此，而此小小的一個遇會，却是萬劫不能復有的了。

朝日出來的地方，在東山的背後，故我們雖可以看見朝霞，但不能見到朝陽。待朝陽出現時，已是金光滿天，人影數丈了。落日也在西山背後，只有滿天紅霞，暗示我們山後的情景而已。唯有月出是在海面可見的。我們天天到海邊去等待，天天有烏雲阻障。到了第五晚，我們等到了七點半鐘，還不見有絲毫影響。那時沙灘上一個人也不見了，天也漸漸黑了下來，環境是那樣的靜，那樣的帶有神秘性。忽然聽見有人一聲驚呼，把我的靈魂從夢游中驚

了回來。你道怎的？原來在東方水天相接處，忽然顯出一條紅光了。那光漸漸的肥大，成爲一個大紅火球，徘徊搖盪在天水相連處。不到一刻鐘，便見滄波萬里，銀光如瀉，一丸冷月傲視天空。我們五天的忠誠的守候，今天算是得到了酬報。於是我們便快快回到旅館，吃了晚飯，雇了人力車，到聯峯山去，在蓮花石公園的蓮花石上，松林之下，臥看天上海面的光輝。那晚的雲是特別的可愛，疏散的是那樣的瀟灑輕盈，濃厚的是那樣的整齊，那樣的有層次，他們使得那圓月時時變換形態與光輝，使得他更可愛。不過若從水面上看，却又顯天空淨著，方能見到萬里銀波的偉大與清麗。

最後的一天，我們到東山的一位朋友家去，玩了大半天。我又學到了一個新的游泳法。晚上又同主人夫婦兒女到鴿子窩去吃野餐，直待滄波托出了一丸紅月，人影漸顯之後，主客方快快的戴月歸去。我們也只得快快的與主人夫婦道別，乘着力車，向車站進發。一路尚見波光雲影，閃爍在樹林之中，送我們歸去。

(二)

北戴河的海濱是東西行的一長條沙灘，海水差不多在他的正南，所以那裏的區域，也就可以粗分爲東中西的三部。

獨立評論 第十七號 北戴河有什麼

東部是以東山爲大本營的。住在那裏的人，大抵是教會派，智識也不太新，也不太舊，也不太高，也不太低。他們生活的中心點是家庭，常常是太太們帶着孩子在那裏住過全夏，而先生們不過偶然去住而已。他們中間十分之九是外國人，尤以美國人爲最多，其中約占十分之一的中國人，也以協和醫院及教會派的爲多。他們大概是年年來的，彼此都很認識，但對於外來的人，也能十分友善。我在那裏游泳的時候，常在水中遇見許多熟人，又常被介紹，在水中和不認識的人拉手，說，「很高興認識了你」！但實際上何能認識？一個人在水中的形狀與表情，和他在陸地上時是很不同的。

中部以石嶺爲中心點。住在那裏的人，大抵是商人，近年來尤多在中國經商暴發的德俄商人。他們生活的中心點不是家庭，乃是社交，雖然也有例外，也有帶着孩子的太太們，但這不能代表中部的精神。代表中部精神的，是血紅的嘴唇，流動的秋波，以及富商們的便便大腹。他們大刀闊斧的「做愛」，着蠅沽蜜似的親密，似乎要在幾個星期之內，去補足自亞當以來的性生活的不足與枯燥。但你若仔細觀察一下，你便可以覺得，在這樣情感奔放，肉感濃厚的空氣之下，還藏着一個滿不在乎的意味。似乎大

家所企求的，不過是一個『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樂而已。

在他們中間很少有中國人，尤其是女子。他們看見我在那裡游泳，都發出驚訝的注意。他們對於中國人的態度，也是傳統的『上海腦筋』。我現在且述一個故事來證明這種態度怎樣的普遍於這類外國人之中。我有一個朋友，在一天下午，曾同着她的丈夫到西山頂上去游玩。那裏下山的路是不甚好走的。他們正走着，忽然看見了兩個法國孩子，男的約有十歲，女的大約是七八歲。那女孩看見山崖峭陡，直駭得發抖，央求那男孩子扶助，但他硬不肯，一溜煙獨自跑下山去了。我的朋友看不過，她讓正扶着她的丈夫去扶携那個女孩子。下山之後，女孩子十分感激，便與他們談天，問他們是那一國的人，她讓她猜，她說『英國吧？』『不是，你不看見我的黃皮膚黑頭髮嗎？』那女孩有點驚訝了，說『日本嗎？』『亦不是，我們是中國人。』說也不信，那女孩一聽之下，立刻駭得唇白眼直，臉上的肌肉瑟瑟的抖着，拚命的叫她的哥哥。那男孩並未走遠，他也駭着了，立刻走來携着女孩子的手，顯出在患難中相依為命的一種心緒。我的朋友看了，又氣，又覺得他

們可憐。她故意的瞪着眼，叱着說，『不准走！』兩個孩

子更駭了，真的立着不敢動。她對他們說，『我此時若不教訓你們，你們將長成爲兩個國際的蠢賊。聽我說，回去告訴你的父母，說今天遇到了兩個你們又怕又看不起的人，那太寬可自己很困難的走下山去，却讓那先生扶着這女孩子，因爲她的哥哥不助她下山。問你的父母，這兩個中國匪賊，比了你們法國的匪賊怎樣？比了你們法國的紳士又怎樣？走吧，願你們今天睜開了你們的眼睛！』那男的倒底大些，很羞慚的伸出手來，給他們道了謝，道了歉，方一步三回顧的，很驚訝的，同着他的妹妹走回去了。

西部以聯峯山爲中心點。住在那裡的，除了外交界中人之外，有的是中國的富翁，與休養林泉的貴人。公益會即是他們辦的。我們雖然自度不配做那區域的居民，但一想到那些紅唇肥臂，或是禿頭油嘴，自命爲天之驕子的白種人，我們便不由得要感謝這些年高望重，有勢有錢的公益先生們，感謝他們爲我民族保存了一點自尊心。我們在公益會的浴場游泳時，心裏覺得自由，覺得比在中部浴場游泳時快樂得多了。並且那裏還有水上巡警，他們追隨着你，使你沒有沉沒的恐懼。

住居西部的中國人既多，女子當然也有不少。但我所

見下水游泳，或是騎馬馳驅的，却仍以幼年女子爲多。二三十歲的女子，大抵是很斯文的坐看，撐着傘看看而已。至多也不過慢慢的脫下了襪子，提着那時髦美麗的長衫，小心謹慎的，在沙灘上輕移蓮步而已。三十歲至四十歲間的女子，則在我住居六天之內，就壓根兒沒見到一個。但做愛的年輕男女却不是沒有，不過他們的做愛，與西人真不相同。中部西人的做愛，是大刀闊斧一氣呵成的，而我

所見西部的中國「摩登」，却是乘着月輪滿狩的時候，遮遮掩掩羞澀澀澀，在沙灘上走走說說而已。並且兩個人單獨出外的很少，大概是五六成羣，待到了海邊再分成對的爲多。雖然我因住居之時不久，見聞有限，但這個情形也未嘗不可以代表住在那裏一部份的中國青年在社交上的自由與管束。

南京鍾山書局

半月刊

國風

創刊號 廿九年九月一日

定價 每册一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通訊及定報處 南京雙井巷文安里五號 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三二二號

- |           |     |               |     |
|-----------|-----|---------------|-----|
| 發刊辭       | 柳詒徵 | 談談我國大學的外國文學課程 | 范存忠 |
| 正義之利      | 張其昀 | 陶風樓記          | 柳詒徵 |
| 熱河省形勢論    | 張其昀 | 自渭北寄江東的一封信    | 徐近之 |
| 日本開化論     | 張其昀 | 甘肅學脈(通訊)      | 李行之 |
| 天文與人生     | 張其昀 | 無錫文獻之一        |     |
| 極短波無線電之回顧 | 倪尚達 | 中國土地人口之新統計    |     |

法律評論

本刊自民國十二年創刊已逾九稔，稱爲我國最有歷史之法律雜誌。每出一冊，均經名家預定，內容豐富，印刷精良，發行迅速。每冊定價五分，半年三元，全年六元。郵費在內。函索即寄。

社址 南京水西門內月牙巷九號

平明雜誌

第一卷第九期 要目

- |              |     |
|--------------|-----|
| 日寇盜竊東北始末記    | 許孝炎 |
| 胡佛施政成績的批判    | 盛蘭  |
| 法蘭西政界現狀      | 林啓興 |
| 中國的煤鐵事業      | 胡東川 |
| 最近日本的軍事工業    | 君林  |
| 德意志視察記(二則)   | 鄭今吾 |
| 世界論壇(二則)     | 疑今  |
| 大事述評         | 熊式  |
| 嘉德橋的市長(長篇小說) |     |
- 附錄：非戰公約三年來之發展

獨立評論 第十七號 北戴河有什麼

